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明转型的四重维度

毕昌萍, 张 怡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乡村文明以现代力量, 乡村文明则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乡村文明的现代转型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对城乡融合、乡村治理、文化赓续与生态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当前, 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从城乡分治转向融合共生、从乡土伦理转向现代伦理、从内生演化转向外部驱动发展的深刻变迁。面对政策支持、科技进步与党建引领等外部机遇, 以及空间重构、文化传承、伦理秩序重塑等内部挑战, 乡村文明转型要以城乡融合重构空间形态, 以精神共同富裕培育文化内核, 以良法善治重塑治理秩序, 探索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路径, 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乡村文明; 城乡融合; 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6)04-0137-10

Four dimensions of rural civilizati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BI Changping, ZHANG Yi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endows rural civilization with modern power, while rural civilization endows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profound heritag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is a crucial component in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serving as a fundamental driver for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mproving rural governance, sustaining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enhancing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ongoing modernization process, rural societ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from urban-rural separation to integrated development, from traditional rural ethics to modern moral systems, and from endogenous evolution to externally driven transformation. Confronted with external opportunities such as policy suppor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Party-building leadership, as well as internal challenges including spatial reconstruc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thical order restruct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should focus on reshaping spatial patterns through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ultivating cultural vitality through common spiritual prosperity, and rebuilding governance order through rule of law and good governance. These efforts will open a creative path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and provide effective support for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rural civil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governance

收稿日期: 2025-08-03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2-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KS071); 浙江省高等教育“十四五”教学改革项目(jg20220202); 浙江理工大学校教学改革项目(jgybddzx202502)

作者简介: 毕昌萍(1973—), 女, 安徽寿县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它不仅强调城市的现代化,更致力于乡村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1]。乡村,作为兼具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不仅承载着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更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的根基”^[2],这些特征和功能共同构成了乡村文明的丰富内涵。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加速推进,中国乡村文明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节点,正经历着深刻转型,既面临着充分发展的时代机遇,也面临着多重复杂的现实挑战。如何实现乡村文明的现代转型,成为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领域能否成功实现的关键问题。

当前,学界关于乡村文明转型的研究已在乡村文化传承保护、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以及乡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例如,吴理财^[3]将乡村文化置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等多重叠加的现代化进程中考察,梳理了其受多重现代因素影响的变迁逻辑。郭婷婷等^[4]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从文化认同、设施建设等维度探讨传统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王向阳^[5]从社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两个关键变量出发理解乡村社会转型,揭示了乡村社会转型的区域性差异特点。郑璐^[6]则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的赋能,指出技术因素是文明现代化转型的新动能。总体而言,现有研究虽涉及文化、社会、经济等维度,但多聚焦于单一领域,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观语境下乡村文明转型的整体性把握不足。鉴于此,本文将乡村文明转型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宏观背景下,从转型趋势、转型核心、转型动力三方面剖析其呈现的特征,结合时代机遇与现实挑战,探索乡村文明转型的实践路径,以期构建兼具根脉意识与现代品格的新型乡村文明形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明转型的意义

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文明传承的载体。习近平明确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7]。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乡村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的基础性与决定性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涵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系统工程,其内在逻辑要求乡村文明必须超越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形态,实现一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深刻转型。

这一转型并非被动应对,而是乡村文明融入新时代发展的主动选择,其深层意涵体现为对城乡关系的系统重构、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中华文化根脉的创造性赅续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格局的持续塑造。

(一) 重塑城乡关系、实现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城乡融合共生的现代化,其核心要义在于超越传统的“城市中心主义”或“城乡二元对立”思维,构建一种新型的城乡发展范式。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共同构成的二元支柱结构中,城市以其集聚效应、创新活力与开放特征,为现代化进程注入技术、资本与人力等关键要素;乡村则凭借其生态韧性、文化底蕴与社会稳定性,为现代化提供可持续的生态保障、文化滋养与社会缓冲。二者功能互补、价值互嵌,共同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完整性与独特性。

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城乡分治”格局,在特定历史阶段虽发挥过一定作用,但长期累积的城乡差距,已构成制约现代化整体进程的显著短板。当前,城乡文明发展的协同性明显不足:一是城市文明的单向度扩散,导致部分乡村地区陷入“同质化”困境,乡土文化特色与生态禀赋遭受侵蚀。二是乡村文明蕴含的生态智慧、伦理规范与文化资源未能得到系统性发掘与现代化转化,城乡文明间出现功能性与价值性“断裂”。倘若乡村文明长期滞后于城市文明,不仅会加剧乡村的“空心化”“老龄化”与文化的“荒漠化”,更会引起社会结构的撕裂,使“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变为“最艰巨最繁重的负担”。因此,乡村文明转型的本质绝非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单向度“殖民”或简单替代,而是通过理念重构、功能优化与制度创新,打破要素单向流动的壁垒,推动城乡关系从“以城带乡”的单向带动模式转向“城乡互构”的双向赋能机制。唯有通过城乡文明的对话互鉴,方能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融合发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文明根基。

(二) 破解乡村治理难题、提升治理效能的迫切需要

乡村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场域,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历史经验表明,农村的稳定与有效治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传统乡村社会主要凭借乡土伦理道德建构起集体性自律的行为规范,依托“乡绅”“乡贤”的模范性力量和约定俗成的村规民约,实现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的相互补充,从而形成高度

的“自洽性”。

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与社会结构转型,乡村逐步由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转向流动性增强、关系疏离的“半熟人社会”,农民群体的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传统治理模式赖以运行的伦理基础与社会结构逐渐松散,其治理效能出现结构性衰退,已经难以有效回应村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多元利益协调需求。若不能及时推动乡村发展转型,重塑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导向与治理逻辑,必然会导致治理体系在新旧模式转换中出现“衔接断层”,这不仅会制约乡村内部秩序重建,也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结构性阻滞。因此,乡村文明的现代转型,并非外部嵌入的治理方案,而是乡村社会在经济基础与社会形态发生深刻变迁之后,于上层建筑层面必然引发的适应型重构。其实质在于通过价值共识重塑、治理机制创新与公共精神培育,系统回应传统治理资源式微与现代治理需求增长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从而重建乡村治理的内生秩序,实现治理效能的整体跃升,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基础。

(三)赓续中华文脉、繁荣乡村文化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深刻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8]乡村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与承载空间,更是民族精神谱系和历史智慧的活态延续。从物质文化层面看,乡村的古村落、古建筑、传统农具、民俗器物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空间上的具象化呈现;从非物质文化层面看,乡村的传统节庆、民间技艺、口述文学、家风家训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精神共识,构成了民族文化与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因此,乡村文化繁荣绝非局部性议题,而是关乎中华文脉赓续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全局性命题。

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城市化、工业化冲击,乡村传统文化面临传承断层与价值弱化的双重危机:一方面,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导致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主体缺失,许多民间技艺、传统习俗面临“人走艺绝”的困境;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与城市流行文化的渗透,使得部分乡村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认知淡化、认同弱化,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逐渐失去影响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球文化交流交锋日益频繁,保持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信愈发重要。倘若任由乡村文明凋敝,我们将面临文化根脉断裂的风险。

如何保持乡村文化特色、延续历史文脉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当然,推动乡村文明转型,“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9],而是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10]。即以现代视角对传统文化进行“筛选、重构与激活”,使其与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科技知识、审美需求相融合。从宏观视野来看,乡村文明转型在文化层面的深层意义,在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气派的文化体系。在继承农耕文明智慧结晶的基础上,推动乡村文化与现代文明要素相结合,培育现代化的中国乡村文明形态,能够确保乡村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得以保存,使其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的生机。

(四)践行生态理念、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乡村地区作为国家生态安全“主战场”,其生态健康程度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直接决定了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诚如习近平强调的,“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11],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乡村生态振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传统乡村文明的“天人合一”理念与当代生态观深度契合。农耕文明中“桑基鱼塘”“稻鱼共生”的循环模式、依山傍水的聚落选址、生态保护民俗等“低熵循环”智慧,为当代生态治理提供了宝贵的传统资源,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生态自觉。

然而,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部分农村地区未能有效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导致农业面源污染、农村人居环境退化、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凸显,乡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到削弱。这种转型中生态伦理与发展模式的错位,已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掣肘。习近平郑重强调:“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更大。”^[12]乡村生态化转型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压舱石”,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我们摒弃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乡村文明转型,必须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乡村发展各领域,激活传统智慧,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生态化、生活方式绿色化、空间格局优化,将乡村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这不仅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环节,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具体实践,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意义。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明转型的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使乡村文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文明转型并非单向度的经济变迁,而是涉及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空间形态等多个维度的系统性变革。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与功能不断演变,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多重特征。

(一)转型趋势:城乡二元对立向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向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式自给自足状态被打破,开启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一方面,外国资本的渗透与本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崛起极大地增强了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促使农村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另一方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帝国主义列强对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发展的对立。尽管如此,小农经济依然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口、生产工具、资本等不断向城市聚集,带来了城市的迅速崛起,而“农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13]。城市与乡村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从乡村“主导”转变为城市“主宰”,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日益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市版图不断扩张,开始挤压乡村空间,城乡二元对立态势愈发严峻,但两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却日渐紧密。面对摆脱贫困的发展新要求 and 城乡关系的新变化,党中央高度重视城乡关系协调,致力于统筹城乡发展,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14]作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基本方针,城乡关系步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将“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15],城镇化进程开启了加速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城乡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即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城乡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16]。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发展从两条并行不悖的轨道并入融合一体的快车道,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势不可挡。

(二)转型核心:乡土伦理向新乡土伦理的现代化重塑

当代中国乡村文明转型中最为根本的变化,在于以社会关系和价值共识为基础的伦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传统乡村社会在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下,呈现出高度的稳定性与封闭性。农民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将土地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塑造出与乡土特色相契合的“乡土伦理”。在这一伦理框架下,乡民间讲究礼尚往来,通过“人情世故”维系着对彼此的支持与信任;家族间注重长幼尊卑,以忠义孝悌支撑着家庭的和谐与稳固;乡村内部遵守村规民约,以自觉良知维持着村庄的秩序与安定。个人行为受到集体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约束,这种乡土伦理深刻影响着农民的日常生活,使传统乡村处于一种平衡和协调的状态。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传统乡村伦理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调整和重塑。勤劳致富不再是农民心中唯一的信条,取而代之的是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和开拓进取的现代经济理念。农民的“安土重迁”观念逐渐淡化,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以期实现物质追求。人口的大量外流导致村落内部人际关系变得松散,传统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的纽带联系日益弱化,乡民交往范围不再局限于乡村周边,而是扩散到村庄以外甚至城市。市场经济的契约观念开始取代“人情”,成为乡村社会交往的主要原则。由此,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正催生一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新乡土伦理”。所谓“新乡土伦理”,是指传统乡土伦理与现代文明元素有机融合而形成的新型伦理体系,其核心特征有二:一是平衡传统性与现代性,实现了乡土伦理的“历史之根”与“现代之源”的成功衔接;二是兼顾地方性与普适性,实现了地域伦理传统与社会普遍价值的有效整合。与传统乡土伦理的封闭性与稳固性不同,“新乡土伦理”将会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优化调整自身,从而达到一种动态平衡^[17]。从市场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是一种进步。乡村人际交往的利益导向日益明显,其社会性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强。乡村社会的人际交往不再以情感联结为主导,而更多成为个体利益的实现手段。这本质上反映了从农业社会熟人“身份认同”到工商业社会陌生人“契约认同”的逻辑转换,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乡土伦理”向现代文明“新乡土伦理”的历史性转轨。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经济理性、公平观念、契约精神和法律意识逐渐生成,与传统伦理观念形成

共生与紧张并存的关系。同时,乡村人际关系的理性化程度逐渐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自我意识、权利意识逐步强化,对法律条文的认同感和践行度逐渐提升。这一转变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结果,反映出中国乡村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的深刻变迁。

(三) 转型动力:内生演化向外部驱动的深刻转变

在农耕文明悠久的历史中,农村一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要场域。农民遵循自然规律的节奏和自然资源的特点,在自然斗争和社会交往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逐渐形成独特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村生活方式,并通过代际传递缓慢而稳定地传承。最初,生产活动仅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繁衍后代、土地产出、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开始影响村落的规模、布局和生产方式,这些变化主要源自内部需求,而非外部力量的强制推动。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大规模的规划和干预,传统农村的发展如同生物有机体一般,为了适应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缓慢而渐进地调整自身。即使在某一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也需要经过长期的适应才能实现传统方式的微调。传统乡村文明就这样以一种稳定的节奏自然演化发展,这种缓慢程度通常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难以察觉的。

然而,工业化迅猛发展的百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传统乡村文明的发展已难以遵循生物有机体自然演化的路径,而是更多地受到外界多方面因素的干预,呈现出以功能划分和空间重构为特点的结构置换逻辑^[18]。一方面,伴随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乡村现代化建设正蓬勃开展。为了适应多方面的需求,乡村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农业生产和居住功能,而是依照地域分布特色和自然资源特点划分出不同的区域。现代功能正在重新分配和取代乡村社会的传统功能,它较少考虑一个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而是更多地强调功能性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结合不同的资源优势以实现村落的各自发展。另一方面,外部力量的介入也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空间的结构重塑。传统乡村的空间定位相对模糊且分散,自然环境与生活场景相互融合,缺乏合理明确的空间布局。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重大决策部署,在该政策导向下,现代乡村对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以及文化空间进行了重新界定,着重关注乡村空间分布的合理性。传统乡村的空间形态已从缓慢的内生演化转向外部驱动发展的快速重构

阶段。

这一逻辑转换不仅提升了乡村的经济活力,丰富了乡村功能的多样性,也对乡村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既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对乡村文明演变的深刻影响,也体现了乡村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中的主动调整和创新,标志着中国乡村在新时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实现转型与升级。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明现代转型的机遇与挑战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下,机遇与挑战交织共同构成了当前乡村文明现代转型的复杂图景。为了更清晰地把握乡村文明转型进程的实际发展态势,有必要对其现实状况进行系统分析。

(一) 乡村文明现代转型的时代契机

进入新时代,乡村文明实现转型面临诸多现实机遇。近年来,中国乡村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科技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为乡村文明的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政策支持、科技进步和党建引领成为推动乡村文明现代化转型的三大核心驱动力。

首先,政策支持为乡村文明的转型奠定了制度基础。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文明的现代化建设,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战略部署。一系列聚焦“三农”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中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19],让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丸”;2020年我国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聚焦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加快发展以二三产业为重点的乡村产业制定了清晰规划;2021年发布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流转以促进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加强乡村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使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这些政策的出台,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广大乡村在社会治理、文化繁荣、乡风文明、生态建设等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乡村文明的现代转型搭建起宏观框架,乡村现代化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其次,科技进步为乡村文明的转型注入了创新活力。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于科技现代化。新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日益展现出推动社会前进的强

大力量,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福祉^[20]。而科技与乡村的深度融合,更是成为加速实现乡村现代化变革的关键。科技赋能使乡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落后”区域,反而成为创新和发展的关键阵地。科技创新成果广泛地惠及乡村发展建设,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智能化、数字化农业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农业生产朝着高效、绿色、智能化方向发展。同时,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乡村治理模式更加精准灵活,实现了从人工管理向智能化管理的转型。此外,绿色农业技术、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乡村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科技正深度渗透乡村生产生活各领域,重塑着乡村发展模式,使现代乡村建设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加速了乡村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最后,党建引领为乡村文明的转型提供了政治保障。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一直是党的工作的重要阵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向基层延伸,基层党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党的建设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发凸显,基层党组织成为推动乡村各项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扎实的基层建设确保了党和政府的各项决策能够更加迅速、有效地落实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基层党组织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共同奋斗机制,合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转型期的复杂环境下,基层党组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应对风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到乡村建设中的各个环节,使乡村发展的长效性得到充分保障。党的建设在乡村文明现代转型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层党组织的坚强引领不仅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政治保障,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

(二)乡村文明现代转型的现实挑战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图景下,乡村文明正处于并将较长时间处于加快转型的过渡时期^[21],在推动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富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

一是乡土建筑传承遭遇困境。乡土建筑不仅代表着广袤的乡村空间,更象征着由方言、习俗、服饰、饮食等构成的“空间意义上的地方性”,以及由乡愁、地方性记忆所构成的“时间意义上的地方性”,是乡

村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建筑正面临着被同质化现代空间取代的风险。具体来说,首先是旅游业对乡土建筑的介入。资本过度开发乡土建筑的经济价值,盲目对其进行商业化改造,将这些历经数百年的古老城镇、村庄和街区卷入了不断拆除和重建的恶性循环中,传统建筑的乡土价值逐渐被异化。其次,对乡土建筑的保护力度不够。自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施行以来,诸多被纳入文物保护单位范畴的乡土建筑得以维系其“原生状态”,然而,仍有大量具备较高历史价值但暂未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乡土建筑处于自然消亡状态。受城市文化影响的乡村青年一代对祖辈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建筑失去兴趣,也缺乏维护和传承乡土建筑的动力。最后,地方“新农村”建设陷入误区。一些地方误将“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建设^[22],无视传统聚落环境的完整性,在古村落中大力兴建人造景观,造成乡镇、民族、地域性特色的丧失。村民追求豪华气派的思想变化也使得新建建筑风格千篇一律,破坏了村落原有的历史风貌。乡土建筑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亟待重视。

二是乡村文化复兴陷入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乡村物质基础得到了显著加强。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会带来上层建筑的波动,乡村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也面临着存续与发展的双重挑战。一方面,乡村文化的价值认同正遭受冲击。近年来,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体形式以其高度娱乐性、视觉冲击强和更新速度快的优点迅速吸引了农民注意力,致使他们从传统的集体活动转向个体化、碎片化的数字娱乐。相比而言,政府推进的文化复兴工作往往侧重于传统民俗活动和乡土艺术教育,活动内容和形式较为单一,通常需要较长时间的培养和浸润才能见效,难以有效吸引村民的广泛参与。因此,地方传统文化在教化和娱乐功能上逐渐丧失优势,被现代文化边缘化,人们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关注和价值认同感也随之减弱。另一方面,乡村文化的“自我定位”模糊。当前,许多乡村的文化复兴工作存在着同质化倾向,过于依赖外部的成功经验,盲目模仿和复制其他地方的文化模式,而忽视地方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发展需求,导致出现“千村一面”的现象。由于缺乏对本土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定位,乡村文化复兴工作方向不清晰,乡村文化似乎变成一种流水线产品,建设形式同质单一化,失去其原有的魅力和生命力。如何突破这一困境,推进乡村

文化复兴工作有特色、见成效,成为乡村文明转型的一大难题。

三是乡村伦理秩序面临挑战。任何社会的存续与良性发展,均依托于两种秩序的坚实构建:一是维系社会生产生活的外在秩序,二是涵养民众内在精神世界的“心灵秩序”。传统乡村社会的支配性力量是“伦理本位”,主要通过家训、礼仪、风俗实现教化和传承,具有高度的连贯性与稳定性。然而,市场经济的介入却使传统乡村伦理秩序面临危机。一方面,村庄“空心化”引起了维系乡村伦理秩序的主体缺位。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青壮年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务工,村里留下的基本是老弱妇孺,维系传统伦理秩序的中心纽带日渐断裂。随着一部分“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在城市购房定居,他们后代的成长环境也直接脱离乡村,传统乡土伦理观念就以第一代外出务工的农民为起点逐代递减。乡村伦理秩序失去了承载主体,必然面临着解体的风险。另一方面,现代价值观念的传播使传统乡村伦理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乡村年轻一代接触到互联网、城市文化以及现代教育之后,更容易接受平等、自由、个人主义等现代价值观,这与传统乡村所强调的长幼尊卑、家族荣誉等传统观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导致他们经常会陷入个人价值选择的困惑。同时,市场经济的逐利本质促使村民更加注重物质利益,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人文关怀和美好品德被异化,甚至出现了道德滑坡。由于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在乡村社会形成稳定共识,传统伦理的约束力量又有所减弱,现代乡村社会伦理规范出现了一定的过渡性失衡,亟须通过价值重塑来构建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新型伦理秩序。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明转型的路径

“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23]在中国当前的时代语境下,这一挑战亦十分严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关键历史阶段,中国乡村文明的现代转型是一场全方位且深刻的实践活动,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从多个维度发力,推动现代乡村文明建设实现稳健、可持续发展。

(一)以城乡融合为引领,重构乡村文明的空间形态

乡土建筑作为农耕文明的物质载体,其保护与更新不仅关乎文化遗产,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实践。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融合共生”的文明演进路径。这在乡村空间重构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它既要守护乡土记忆的物质根基,又要赋予传统空间以现代生命力,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构建一种既能延续文脉、又能满足现代需求的新乡村空间形态。

在制度建构层面,乡土建筑保护需要完成从行政管控到现代治理的范式转换。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理念在空间治理中体现为以文化价值为导向的制度安排。以福建永泰庄寨群为例,其保护实践展示了制度创新的深层逻辑:通过建立“建筑遗产预警机制”和“保护责任终身追责制”,不仅构建了技术性的保护体系,更形成了“价值识别—风险评估—责任落实”的完整制度链条。这种实践突破了传统的文物保护思维,将建筑遗产保护纳入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框架,实现了从单一部门管理到多元主体共治的转变。更为关键的是,它建立了保护与发展的内在联结机制,使传统建筑的保护成为地方现代化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外在负担。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继承中创新、在保护中发展的治理智慧。

在创新实践维度,乡土建筑的活化利用需要超越简单的“修旧如旧”,实现从物质保存到价值再生的深刻转变。例如,浙江湖州埭溪镇茅坞村的实践表明,成功的乡村空间重构需要在三个层面实现突破:一是功能重构,通过植入现代使用功能使传统建筑重获生命力;二是价值重构,在保留建筑本真性的同时,挖掘其当代文化价值;三是意义重构,让传统建筑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这种创新探索实质上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文化主体性,避免陷入西方模式中的文化断裂危机。茅坞村的经验表明,真正的保护不能止于物质修复,而要处理好人与建筑、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系,从而使乡土建筑不再是被凝固的历史遗存,成为承载当代生活与文化创造的动态载体。

在主体培育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人为本”,这一原则在乡土建筑保护中体现为从“为居民保护”到“与居民共同保护”的理念革新。江苏周庄的实践提供了更深层的启示:通过建立建筑遗产认养制度和传统工匠培养体系,让村民在具体的修缮与维护中获得经验积累和重拾文化自信;通过设立乡建合作社,构建起资源共享与利益共担的制度平台,让村民不仅成为保护工作决策的参与者,更在收

益分配和空间再利用中实现主体地位的真正落实。这种以主体培育为核心的保护路径,体现了从“物”到“人”的重心转移,其深层意义已超出对建筑本体的保护范畴,指向培育具有文化自觉与公共意识的现代公民。当村民从被动的保护对象转变为主动的保护主体时,乡村空间的现代化转型就获得了最持久的内生动力。

(二)以精神共富为核心,培育乡村文明的文化内核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本质要求决定了乡村文明转型必须超越单纯的经济维度,实现文化层面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文化认同理论的视角看,乡村文化振兴不仅关乎文化传承,更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乡村文化主体性的深刻实践。这一过程需要构建完整的文化发展链条:从内在的文化认同培育,到外在的文化品牌塑造,再到可持续的文化价值转化,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文化发展闭环。

首先,要丰富乡村文化活动形式,强化村民价值认同。乡村文化的传承主体是农民,他们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成果的享用者,要想激活广大农民群众对乡村文化的传承动力,必须培养农民的文化认同感。村委会应面向农民的兴趣和生活习惯设计多样化的文化活动,以激发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例如,贵州台盘村的“村BA”将篮球赛与苗族“吃新节”传统相结合,以村民为参赛主体,在比赛间隙融入苗族歌舞、非遗展示等活动,在保留乡土文化内核的同时,也以喜闻乐见的体育形式增强了大众的参与感^[24]。该村结合短视频和直播等现代传播方式,让“村BA”的热血瞬间与乡村风情通过网络走向了全国。从赛事组织到现场助威,村民在共同筹备、共享欢乐中增强了对本村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乡村社区可借鉴此类模式,突破传统民俗活动的单一性,让本土文化更具吸引力。

其次,要明确乡村文化独特定位,塑造地域文化品牌。我国多地乡村正在积极探索文化品牌建设,本质上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文化独特性的战略选择。从江苏周庄的古镇保护到陕西袁家村的民俗体验,成功的文化品牌建设都遵循着相似路径。乡村文化建设应在尊重地方差异的基础上,立足自身实际,形成因地制宜的发展思路。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乡村文化的独特价值,各地应充分挖掘历史文脉、民俗传统和自然禀赋中蕴含的文化资源,建立系统性的文化研究和推广机制。要防止在新农村建

设过程中盲目模仿其他地区经验或简单套用外部模式,避免文化趋同导致的地方特色弱化。地方政府可组织相关专家团队,对乡村文化生态进行系统调查和评估,开展编纂村史志书、整理口述档案、建设地方文化数据库等工作,为塑造地域文化品牌提供依据。通过明确文化定位、凸显差异特色,推动乡村文化在开放交流中实现内生发展与持续繁荣。

最后,要推动文化与经济联动发展,实现乡村文化持续繁荣。乡村文化既是精神资源,也是重要的发展资源。在保护与传承的前提下,可以探索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路径,将农耕文化、非遗技艺等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动能。结合乡村本地特色发展文化旅游、乡村手工艺、传统节庆等项目,促进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在此过程中,乡村居民不仅能获得直接的经济收益,还能通过与外界的互动加深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增强自身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中。福建土楼的保护性开发提供了有益借鉴:通过限定商业化边界,保持建筑的生活功能;通过文创产品开发,拓展文化价值实现渠道;通过社区参与机制,确保文化收益惠及当地居民。这种模式既尊重了乡村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又回应了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形成了文化保护与经济良性互动。与此同时,要完善文化产业监管和公共服务体系,防止资本逐利造成文化内容的浅化和形式化,确保文化产业发展方向符合始终尊重和保护乡村文化的核心价值。通过政策引导、人才培育与机制创新,使文化建设形成自我积累、自我更新的良性循环,让乡村文化振兴真正成为推动乡村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动力。

(三)以良法善治为根基,重塑乡村文明的治理秩序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虽历经波折,但始终未脱离乡土根基。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乡土伦理结构支撑了乡村社会运转的内在秩序,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社会动力。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在社会关系与情感纽带层面达成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协同,而乡村伦理秩序的重构则是这一现代化进程于基层社会的具体映射。通过重新构建以亲情、乡情和公共情感为联结的社会关系网络,重塑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信任机制,可使现代化发展兼具制度理性与人文关怀,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形态筑牢重要的伦理

根基。

首先,要恢复乡村家庭与社区的功能,重建社会信任的情感基础。家庭是伦理教育的起点,社区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间,两者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的基本伦理单元。在人口流动加快和情感纽带松散背景下,乡村要以家庭和社区为切入点,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建情感共同体。一方面,强化家风家教建设,弘扬优良家训家规,使家庭重新成为道德培育与价值传递的重要空间。另一方面,完善社区协商与公共服务体系,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村民议事会等基层平台,推动村民在公共事务中加强互助与信任。与此同时,针对“空心化”带来的乡村主体力量缺失问题,要鼓励乡村探索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支持体系和公共福利制度,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创业环境,吸引外出务工的年轻人返乡或留乡工作,逐步实现人口回流与情感回归。

其次,要推动现代价值与传统伦理的深度融合,塑造符合新时代的乡村伦理观。传统乡土伦理重情重义,强调人伦关系与集体责任,现代社会则更加注重规则意识与公共理性。两者并非对立,而是能够在乡村社会治理中互相补充。面对乡土社会巨变过程中内生性力量式微、外生性力量逐渐占据主导的发展趋势,要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将法治理念、平等意识、责任精神融入乡村公共生活,这是保留乡土社会底色、构建现代化乡村伦理观的必然选择。在具体实践中,要完善村级自治制度,引导村民从“被治理”转向“共治理”。健全村规民约的修订与执行机制,将其与法律法规有机衔接,防止形式化倾向,让传统礼俗实现制度化传承。同时,要推动法治宣传、道德评议等形式常态化,让法治精神融入乡村日常生活,使村民在熟人社会中也能遵守公共规则,在人情往来中不失公平与理性。此外,要培育具有现代视野的新型乡贤群体,通过道德感召与实践引领,发挥其在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等方面的重要引导作用,逐步确立起适应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集体伦理观念。

最后,要完善道德引导机制,重塑乡村社会的道德共识。“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两者并用。如果人人都能自觉进行道德约束,违法的事情就会大大减少,遵守法律也就会有更深厚的基础。”^[25]维护乡村社会的伦理秩序要在法治保障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道德规范的柔性约束功能。政府要完善道德评价和道德激励机制,大力支持乡村开展“最美媳妇”“文明家庭”等评选表彰活动,树立优秀的乡村道德

典范,通过公共道德教育体系增强村民对道德建设的自觉性。浙江余姚邵家丘村构建的多元化道德激励生态机制为此提供了有益经验。邵家丘村通过设立“道德银行”,把社会公德、个人品德转化为可量化积分,评选出的道德模范能够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奖励,让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道德行为的社会价值与现实回馈,充分激发了村民参与道德实践的积极性,成为余姚推动乡村文明振兴的重要“法宝”^[26]。这种制度化的道德建设举措,使伦理规范从外部倡导转向内生自觉,推动村内形成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良性循环,有效维护了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结 语

本文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宏观语境,将乡村文明置于城乡关系、文化传承、社会治理与生态建设的互动之中加以考察,揭示了乡村文明转型的内在逻辑与时代意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并非割裂对立,而是在城乡融合、伦理变迁与动力转换中相互渗透、彼此塑造。面对外部机遇与内在挑战,乡村文明转型的未来不是要固守传统或全盘更新,而是要找到一条既能延续乡土根脉、又能注入现代活力的创造性路径。这既需要政策与科技的推动,也依赖于文化自觉与伦理共识的内生动力。乡村空间的重塑、文化的激活、治理的创新与价值的重建,共同构成了乡村文明走向现代的现实图景与可能路径。本文突破单一经济或社会叙事的局限,尝试以文明转型重构的视角阐释乡村现代化,为理解乡村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思路。总体来看,乡村文明的现代转型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必须保持文化自觉与价值坚守,使传统的生命形态在新的社会结构中获得再生,从而让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大地上呈现更加深厚、持久而富有生命力的文明景观。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
- [2] 王露露.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J].中国社会科学,2021(12):89-109.
- [3] 吴理财.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64(1):20-30.
- [4] 郭婷婷,王金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振兴实践路径探析[J].农村科学实验,2025(11):186-188.
- [5] 王向阳.社会结构、劳动力市场与乡村社会转型的区域差异:兼

- 论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基础[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5, 46(3): 181-189.
- [6] 郑璐.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之三维论析[J]. 山西农经, 2025(14): 33-35.
- [7] 习近平.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J]. 求是, 2019(11): 4-10.
- [8]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的乡土情[N]. 人民日报, 2024-12-17(01).
- [9]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26.
- [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260.
- [11] 郑有贵. 守好“三农”基本盘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J]. 红旗文稿, 2023(5): 41-44.
- [12] 高世楫, 王海芹. 让绿水青山造福人民泽被子孙[N]. 人民日报, 2022-07-22(11).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84.
- [14]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求是, 2002(22): 3-19.
- [1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N]. 人民日报, 2010-02-01(01).
- [16] 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 (2025-10-23)[2025-11-26].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0/content_7045444.htm.
- [17] 王露璐. 伦理如何“回”乡村? [J]. 博览群书, 2017(5): 105-107.
- [18] 李河. 中国乡村文明的百年变迁: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融合中国[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22: 10.
- [1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9-11-27(01).
- [20] 王永义, 姜迎春.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J]. 红旗文稿, 2023(14): 39-42.
- [21] 向德平, 傅丽丽.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转型[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 12-25.
- [22] 乔爽, 刘延斌. 乡土建筑现状问题浅析[J]. 美术教育研究, 2013(12): 163.
- [23] 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M]. 李培林,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1.
- [24] 王雪峰. 贵州“村BA”: “动起来”的民族文化展厅[N]. 中国文化报, 2025-09-10(06).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38.
- [26] 胡建东, 余姚“道德银行”: 为文明城市增添新风尚[J]. 宁波通讯, 2019(3): 56-58.

(责任编辑: 陈丽琼)